

目 录

前 言.....编者(1)

一位可敬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王京岐事略.....周希灿(1)

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的张淮(怀)南先生

.....赵 一(6)

怀念张怀南(冲)先生(节录).....(台湾)朱开来(17)

怀念父亲骆清华.....骆锡耀(25)

邵力子先生家世与前期经历.....朱仲华(34)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沈钧儒的光辉业绩.....王林涛(46)

萍踪随缘录

——忆我的外公胡愈之.....胡孟岗(51)

为爱国民主事业奋斗一生的马叙伦

周建人 徐伯昕 赵朴初

.....雷洁琼 葛志成 柯 灵(66)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周建人与故乡绍兴.....何信恩(76)

回忆先父章乃器一些往事.....章翼军(87)

爱国民主英勇战士施复亮.....王水湘 陈烈炯 王祖汉(93)

对陈叔通手札的若干注释.....范尧峰(109)

杭州的梅花与陈叔通的《百梅图》.....张 新(114)

马寅初先生与故乡.....尹文欣 周乃光(116)

热爱祖国的工商业家

——回忆我的父亲包达三.....包启环(121)

回忆何燮侯伯父.....何逊菊(127)

我所知道的吴山民.....杜承钧(136)

宋云彬其人其事.....曹湘渠(146)

农工民主党浙江省组织创始人蔡一鸣.....徐 勉(157)

追思李士豪一生.....陈 浪(170)

回忆和唐巽泽先生合作的日子.....舒 文(179)

怀念唐巽泽.....周平英(186)

爱国知识分子坎坷的一生

——回忆陈礼节同志.....厉商华(193)

回忆吴化文.....林世英(207)

郭静唐生平事略.....姜枝先(220)

走向黎明前后.....何志斌(230)

沙孟海先生的一些往事.....陈修良(258)

一位可敬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王京岐事略

周希灿

王京岐（1895—1925年）是我国五四时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奉孙中山之命，四次赴法，历时五年，在组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以及领导留法学生、旅欧华人反帝爱国斗争的活动中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不应该遗忘的可敬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探索救国道路

王京岐（又作王景岐），浙江嵊县中南乡长安村人，出生于1895年。父春林是一个豪侠之士。京岐自幼聪颖，勤奋好学。5岁入小学，14岁毕业于县立一小后就读于新昌中学，17岁入南京金陵大学，次年转杭州之江大学。五四运动唤醒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为青年，他们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新道路。王京岐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很快就投入了以学习西方民主科学为目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入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6月远涉重洋，赴法留学。先在巴黎刚福郎司公学补习法语，继又在阿佛尔工业学校攻读。他立志于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决心将学到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来振兴祖国。由于他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才干，很快地团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成为当时留法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和核心人物。

在斗争中初露锋芒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等前往法国密谋借款5亿法郎，以川滇粤桂四省采矿筑路权及全国印花作抵，王京岐闻之大愤，他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召集侨胞，发起拒款运动。他们带领旅法学生包围大使馆，击其秘书王某，中法当局被迫放弃此议，使斗争取得胜利。同年9月，在留法学生进占里昂大学、争回入学权的斗争中，他和李立三等120人组成勤工俭学学生先发队，他是第一批占领里昂大学的一个。斗争失败后，王京岐被投入临时监狱。在狱中，他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起开展绝食斗争，发表《绝食宣言》，抗议法国当局之暴行。10月14日，他和100多名学生代表被遣送回国。斗争实践使他的思想起了深刻的变化，萌生了“革命救国”的念头。

受命组建驻法总支部

王京岐回国后，更加关心祖国政治形势，赞同孙中山三民主义救国主张，于1922年3月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受孙中山委派，再次赴欧担负起组织国民党党务的使命。出国前孙先生当面指示他，到法国后，要联络同志，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

早在1905年春夏间，孙中山第二次赴欧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中国留学生就革命方略和依靠力量等问题开展讨论，随后建立革命组织，有30余人宣誓加入；在柏林向留德学生宣传民主革命主张，有20余人加入革命组织；旋由德至法，在巴黎又有60余人入盟，但没有正式成立党部。1922年，孙中山鉴于欧洲华侨日益增多，国际关系紧张，国内军阀暴戾，于是特派王京岐为欧洲中国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旅欧党部。

王京岐到法国后，以里昂中法大学为中心，建立中国国民党驻法里昂通讯处。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联络，周恩来等大力支持和帮助王京岐开展工作。1923年6月，周恩来、林蔚、尹宽三人代表旅欧中国共青团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并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所属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旅欧组织，开创了国共合作的先导。这是王京岐与周恩来等共产主义者密切合作的丰硕成果。

同年8月，王京岐回国复命，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周恩来对两党合作的原则及党务发展的方略。孙深表赞许，并委派周恩来负责筹组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在欧洲全面组党。11月，周恩来受王京岐之托，在里昂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公推王京岐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在王回国期间兼代执行部长，增设通讯处于巴黎及德、比各国。1924年1月，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熊锐、朱德等共产主义者陆续担负了国民党欧洲支部的领导职务。6月，王京岐从广东返巴黎时，国民党组织已扩及到比利时、德国等地，于是正式建立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因当时英、俄均有总支部组织，西欧大陆各国用“驻欧”名义不妥，故改称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任总支部主席。7月20日，王京岐同周恩来一起，在巴黎哲人大厅召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该组织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派机关”，大会号召全体党员“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会后，周恩来奉国共两党中央之召，回国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王京岐和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为周恩来送别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仍保存着。

坚强不屈的反帝爱国斗争

周恩来回国后，王京岐仍一如既往和共产党人、共青团员李富春、林蔚等共同领导旅欧国民党员并肩战斗。王京岐被推为华人主席，经常发表演说。凡举行重大示威运动，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和中共旅欧支部、共青团旅欧总支部总是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1924年9月21日，旅法50个团体在地理学会召开“通电国内讨曹（锜）、资助中山革命”的华人大会；1925年2月7日，旅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巴黎十三区举行“二七”罢工两周年紀念会；同年4月12日，在巴黎召集有华侨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侨胞参加的孙中山追悼大会，特别是1925年6月，旅法华人声援“五卅”斗争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王京岐都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五卅”惨案发生后，王京岐于6月7日在巴黎召开华人大会，声援“五卅”斗争。大会作出通电祖国声援，对欧民众宣传惨案详情，忠告法国政府支持正义，举行华人示威运动大会等五项决议。并组织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分头办理有关事项。同月14日举行大示威游行。法国政府派出军警、增设岗位，把守巴黎各路口，如遇三五名同是华人，即令就地解散，示威队伍难于集中，只能零散分发传单，当天有5名散发传单者被捕。接着王京岐又在巴黎十三区秘密开会，决议包围驻法大使馆，要求大使馆陈策执行：向法政府交涉支持正义，电慰被难同胞并勉国人等四个条件。21日，即选出机警人员120余人，分乘4辆大汽车，直入大使馆，陈策回避不及，被迫应允执行，立将所有电文一一签字发出，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法国当局闻之大惊，下令出动军警大肆搜捕3天，100余人被拘捕。6月23日王京岐被捕，囚于加信沿。这时王的肺病日益

加深，哮喘厉害，咯血不止。7月27日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王京岐抱着日趋恶化的病躯，满腔悲愤地从马赛回国。10月19日，轮船驶向红海求婆地海口时，气候突变，身体不能适应，溘然与世长辞。按照航海的惯例，他被沉埋在地中海的波涛之中，时年30年。

永远纪念我们死去的同志王京岐

王京岐客死途中的噩耗传到巴黎，旅欧同志悲痛万分。1925年11月25日，旅法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布瓦街23号的伯利维尔大厅，举行了悼念王京岐大会，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邓小平（邓希贤）主持会议，他宣布这次会议是为了悼念被法国驱逐出境、在回国途中死在船上的王京岐而召开的。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赞扬王京岐为革命事业而献身、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最后总结时说：“我们吁请所有与会者继续开展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此来永远纪念我们死去的同志王京岐。”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回国代表团的《党务报告书》中，提议对王京岐从优议恤，飭嵊县县党部建碑纪念，将其事略修入中国国民党史。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祖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值盛世修志，嵊县已根据他的活动和事迹，将这位不应该遗忘的可敬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立传编入县志，永资纪念。

1988年4月10日

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的 张淮(怀)南先生

赵 一

张淮南先生(1903—1941)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的联络和谈判代表。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忠诚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卓著勋劳，对于他的历史功迹，国共双方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以身许国 匡济天下

张淮南先生名冲，字淮南(又字怀南)，别号御虚。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瑄头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淮南先生少而聪慧，5岁能诵《诗经·关雎》，8岁入家塾读书，12岁为同乡宿儒高性朴先生所赏识，允将独生女高月珪(志骧)许与淮南订婚。14岁考入县立柳市第三小学高级班。喜读王安石、苏轼、叶适的文章和陆贽的奏议，文思益广，作文引证故事，洋洋大篇，自抒怀抱。他自言“平生最信仰范仲淹”，常常高声诵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他与同学登上中雁荡玉甌峰，曾写七绝一首，直抒爱国情怀，诗云：“万方多难此登高，一览群山意气豪。四海生灵尚涂炭，澄清天下敢辞劳。”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冲激到东海之滨。这年下半年，淮南先生考入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大家推选他为理事长。每周集会一次，共同研究新文化、

新思潮，唤醒同胞，复兴中华。并经常出壁报，刊出散文、诗词、歌赋。有时他还率领同学到温州东门、朔门各轮船码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参与爱国运动。

1922年夏，张淮南先生从温中毕业，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大学毕业后不久，到苏联莫斯科作短期留学。

张淮南先生在东北期间，秘密进行反对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1927年3月，汉奸高士勋与警署勾结，从淮南先生住室里搜出油印机和宣传品。淮南先生被逮捕下狱，赖法政大学校长雷殷庇护，不至处死，结果判了3年徒刑，羁押在吉林监狱。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后，改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淮南先生经多方营救，终于恢复自由。出狱时面黄肌瘦，虱子满身。他回到南京后，由同乡同学萧铮引见，始受知于陈果夫，得到陈的器重。不久，就被派回哈尔滨任国民党党部特派员，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并创办了《哈尔滨日报》。通过报纸宣传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吾之民族”的思想。他还遵照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的政策，组织铁路工人，加以训练。嗣后，淮南先生曾调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均辞不赴命，后又调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和设计委员。1933年任中央宣传部电影科科长。翌年，淮南先生同张北海、罗学濂、郑伯豪等人出国考察欧洲政治经济，回国后撰写了《苏德土意访问录》一书。不久，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兼任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1935年，淮南先生参加中苏复交谈判载誉归来，获得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代表的支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年仅32岁，然临事有恒，持躬至谨。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赞扬说：“淮南

先生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

团结御侮 不遗余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亦感到唯全国上下一致，共赴国难，才是唯一出路。张淮南先生便是其中认真力行的一个。

张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早在西安事变之前。1936年，他多次受命和中共代表进行联络谈判，先后在香港、南京、上海和中共潘汉年等人频繁接触。12月初，他还受命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建立了南京与陕北的电台联系。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西安事变”时，张淮南先生作为蒋介石随行军政人员亦被羁留，周恩来未及与之谋面。事平后，1937年2月6日，张淮南和顾祝同奉命抵西安，自9日起开始与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不久，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边区政府的地位以及两党合作的形式、纲领等问题上。谈判开始时比较顺利，双方意见曾一度趋于一致。3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逆转。顾祝同、贺衷寒横生枝节，推翻原议，致未能达成协议，只同意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其时，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对其主任秘书张梅谷说：“淮南过于冒险，做得好，果能立功，做得不好，会成为千古罪人。”淮南先生闻知后坦然处之，他答同乡张梅谷说：“年年围剿，节节失利，事到如今，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实在不能再打下去。我将尽我职

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关于西安谈判之反响，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写道：“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3月下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张淮南先生和邵力子先生也参加了会谈。（编者按：据有关史料，杭州谈判参加者仅周、蒋二人。）中共提出了六点声明，蒋介石在红军及苏区等问题上，原则上接受了中共的条件。双方同意将继续会谈两党合作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问题。5月，张淮南先生随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与周恩来为商两党团结事，几个朝夕往返，多次会谈。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继续会谈，双方发生争论时，宋子文、宋美龄、张淮南先生曾从中往返磋商。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淮南先生在庐山，继续谈判关于红军改编诸问题。“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促使国共合作谈判加快了步伐。

8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参加。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再次谈判，张淮南先生也参加了会谈。直到“八·一三”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烧到蒋介石大本营，蒋介石才决心抗战。南京谈判终于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以及长江南北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团结御侮讲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张淮南先生为促成国共合作团结御侮，

奔走不辞劳，始终其事。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国共两党和朝野人士，皆众口赞誉。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说：“他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途径。他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周恩来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他说：“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惟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其后，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奔走坛坫 遂树强援

张淮南先生不仅奔走国内团结，且复奔走坛坫，为争取国际强援，同样作出了贡献。周恩来谓其“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势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

淮南先生早年留学苏联，精通俄文，熟知苏联的风土民情。1932年他参加了中苏复交谈判。1935年秋，蒋介石了解到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态度后，便想进一步同苏联签订对日军事同盟，将此重任交陈立夫和淮南先生。后陈、张中途奉召回国，虽未及完成使命，仍不放松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拉莫洛夫接触，寻求签订中苏对日军事同盟渠道。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

约》签订的第三天，张淮南先生辄出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协力建树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议定友邦援我办法。

张淮南先生从苏联回国后，在汉口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并参加教学工作。后因战局关系，该校迁往桂林，后又迁到重庆，在桂林、衡阳设立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俄文翻译人才。早在1935年，淮南先生曾和孙科、冯玉祥、邵力子等人在南京创办中苏文化协会，他担任常务理事，积极从事沟通中苏文化交流，对于树德睦邻起了良好的作用。

1937年夏天，张淮南先生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秋，调任军事委员会外事组组长。为了联络友邦人士，增强抗战力量，这年冬天，军事委员会外事组扩充为顾问处，办理友邦来华帮助抗日的军事顾问的接待、分配工作。外籍顾问以苏联最多。淮南先生精通俄语，并通晓德、法、英等国语言，蒋介石遂遴选他担任顾问处中将处长，接待各国顾问，把他们的意见译成中文转达政府，向蒋介石直接请示机宜。有一次，苏联顾问跟淮南先生谈起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要求译成俄文供他钻研。淮南先生对此十分重视，就叫编审股邀请两名精通俄文和古文的译员，一周之内把《孙子兵法》译成俄文，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礼物送给苏联总顾问。苏联总顾问1940年秋重返中国时，带来斯大林送给张淮南先生一件藏青色西装呢大衣。冬，淮南先生经蒋介石批准，以顾问处名义向斯大林回送了珍贵的水獭皮大衣。

力维大局 死而后已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会后陆续秘密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取消了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和桂林办事处。从此，团结之局，日陷险境。

而淮南先生独持正义，力主以团结御侮为尚。

是夏，周恩来回延安述职。事先，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他北返延安。但是，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故意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淮南先生赶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淮南先生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贺耀组，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亲自送到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他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此后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赖淮南先生斡旋其间，得使局势未臻恶化。初夏，周恩来复返重庆，淮南先生与周恩来继续相往还，奔走团结抗日仍不稍懈。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淮南先生看了《中央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气愤，当众把报纸摔在地上，两手交在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好久不发一言。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及有关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国民党害怕进步舆论，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经常去《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淮南先生陪同周恩来在寒冷的黑夜里，僵持鹄立于曾家岩十二小学门前达二小时余。当夜，共产党人陈家康送他从一条黝黑的小巷里出去，上车时，淮南先生问陈家康对于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淮南先生喟然叹曰：“我死必在君先！”

自1月至5月，国共两党之间裂痕进一步加深。“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淮南先生对于国民党加紧反共殊忧虑，并预感到顽固分子可能向他下毒手。一天，他

把顾问处会计叶至刚叫到自己办公室，他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暗杀的。”说毕，取过信笺，给儿子张炎、张种立下遗嘱。并对叶至刚说：“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与周恩来先生来往信件，全部烧毁。”

6月，苏德战争起。淮南先生此时已不能施展才能于国内，期望偿志于国际活动。不料，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天患了伤寒，一病缠绵，竟至不起。淮南先生病倒后，周恩来亲自到病榻前慰问，“初以纳粹第五纵队作祟戏语先生”。嗣后，“数次视先生，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他还嘱周恩来与某先生保持联系。陈家康上他寓所视病时，先生于病榻上纵谈国事，意谓国际局势有所变化，英苏接近，可能成立同盟，共反侵略，对我国抗战亦有利。但望国内团结问题，亦有新开展。并嘱转达周恩来先生。

7月，重庆天气炎热，且迭遭敌机轰炸。他移居到离城40里的郊外云龙旅馆山洞里，由夫人余柳服侍。疗养期间，犹不废簿书，殷殷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蒋介石有紧急军事问题要与苏联总顾问商谈，由陈布雷打电话请他担任翻译，他不稍迟延，立即进城，勉力支持，翻译两个多小时。有时，还扶病到苏联大使馆，与潘友新大使接洽重要事宜。他在一封家书中曾说：“重庆连受轰炸，死伤约七千人左右，城中已成废墟，断墙残壁，触目伤心……，丁此大劫而未能匡济，□□自思彷徨不已。辛勤能补拙，克苦将事，或可辅助中央挽□危局。”不幸，淮南先生终以身体日渐羸损，于1941年8月11日在重庆云龙旅馆逝世，年仅39岁。

斯人不再 精神尚在

淮南先生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8月12日，蒋介石特派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前往云龙旅馆大礼堂主持丧礼。13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李克农等纷纷致电其家属唁慰；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陈立夫、驻苏大使邵力子，以及冯玉祥、何应钦、谷正纲、方治、于学忠、孙连仲等，也分别发来唁电、唁函。10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明令褒扬张淮南先生。

张淮南先生追悼会于11月9日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国民党各院、部官员何应钦、冯玉祥、吴铁城、贺耀祖、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何成浚等，重庆市各机关团体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苏联武官崔可夫和使馆代表等，2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挽联甚多。有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敬献的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敬献的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朱德、彭德怀敬献的挽联：“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敬献的挽联：“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钱之光、徐冰、陈家康敬献的挽联：“奔走团结，劳怨不辞，予我人以楷模；坚持抗战，忠信有加，诚国家之栋梁”。

追悼会由吴铁城主持，蒋介石亲临祭奠，并送了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周恩来、陈立夫、朱家骅发表了演讲。周恩来演讲时声泪俱下，闻者无不动容。旋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重庆市党部、顾问办事处、中苏

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留俄同学会、温州旅渝同乡会等机关团体，分别公祭，吊唁者络绎不绝。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悼念张淮南先生》，高度评价了淮南先生奔走团结戮力御侮的业绩。悼文中说：

“淮南先生逝世将三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远不能忘怀。

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继任钜艰，赓续前功，应早在国民党贤明当局的选择之中了。……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尽多英才，尤多关心团结致力御侮之人，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

……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